

发挥文物资源优势 让大遗址焕发时代光彩

耿玉璠

河南文物资源丰富,大遗址分布密集。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河南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3000多年,遗存下来的文物数量多、分布广、品类全、价值高,全省现有不可移动文物65519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0处,世界文化遗产5项2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521处。自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开展以来,河南共55项考古发现获此殊荣,其中有23项重大考古新发现均与大遗址考古相关。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河南14项入选。

河南的文化遗产,以史前大型聚落、古代都城遗址、历代帝王陵寝、重要手工业遗址为主要类型,占地面积巨大,如邙山陵墓群占地面积为756平方公里(不含洛南东汉帝陵),仅保护范围便达192.8平方公里。这些文物资源价值深厚,全面凸显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对于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展现中国历史主流主脉、服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河南扎实推进大遗址保护管理利用,经过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和大遗址保护工作,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效显著,探索创造了郑州“生态保遗”模式和大遗址保护“洛阳模式”,贡献了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河南经验。

河南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主要成绩及典型经验

“十四五”时期,国家确定的150处大遗址中,河南有16处入选,另有涉及长城、大运河两条线性遗址5处,总数达21处,居全国榜首。近年来,河南围绕大遗址保护管理、活化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全国贡献了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河南经验。

保护第一,提高大遗址保护管理水平

在大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方面,十年来共对18处大遗址开展了151项考古发掘。陆续出版《二里头》《隋唐洛阳城》《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报告》等22部大遗址相关考古发掘报告,考古发掘研究整体水平取得长足进步。

在大遗址保护规划与出台地方性法规方面,目前已公布实施20余处大遗址保护规划,其中仰韶村、二里头、偃师商城、殷墟、郑韩故城、隋唐洛阳城等6处大遗址保护规划已完成修编,整体上保证了大遗址保护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推动出台了《洛阳市汉魏故城保护条例》《安阳殷墟保护管理条例》《宋陵保护管理办法》等10部大遗址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长期性、制度性的法律法规保障。

在大遗址保护工程方面,近年来,共实施了190余项大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利用、环境整治类工程和30余项大遗址安全防范、技术防范、消防工程,有效保护了大遗址本体安全,推动了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文化惠民,加快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在遗址博物馆建设方面,陆续建成开放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殷墟博物馆新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等17座遗址博物馆,另有北宋东京城遗址顺天门、平粮台古城、双槐树等3座遗址博物馆正在加快建设。

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面,截至目前,河南获国家文物局公布和立项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18处。其中殷墟、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故城、郑韩故城、郑州商城、二里头、仰韶村、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8处挂牌。庙底沟、偃师商城、清漳寺汝窑宫、平粮台古城、三杨庄、贾湖、城阳城址、宋陵、魏国墓地、南阳黄山考古遗址公园等10处立项。

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的扎实建设,不仅有效保护了大遗址本体,还产生了良好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郑州市建设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已达55处,保护了遗址本体安全,优化了周边环境风貌,增强了绿色效益。洛阳市在统筹推进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过程中,注重改善民生,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植入多种文旅新业态,在实现大遗址保护的同时,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创新发展,探索大遗址保护新模式

近年来,河南积极探索大遗址保护新模式。其中,郑州以保护为主,适度绿化,积极推广大遗址保护的“生态保遗”模式。洛阳结合城市规划,发展出远离老城建新城的“洛阳模式”。

“生态保遗”模式:郑州坚持政府主导,采用生态绿化模式,于2017年初全面实施“生态保遗”工程,促进遗址保护优化、生态环境提升、休闲空间拓展、城市形象凸显。截至目前,郑州市共建成开放遗址生态文化公园55处,完成生态绿化面积5万余亩,在传承文脉、服务社会、优化环境、带动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洛阳模式”:近年来,洛阳采取“避开老城建新城”“先考古、后建设”等措施,在保护遗址本体的同时,逐步走出一条“大遗址保护与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和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之路,打造独具魅力的隋唐文化标识。

科技赋能,推进大遗址活化利用

数字技术的运用,为大遗址活化利用提供了一种全新路径。郑州市将大遗址与文旅线路深度融合,利用数字技术形成“考古探秘”“寻根拜祖”等主题体验。隋唐洛阳城遗址



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隋唐洛阳城宫城核心区遗址夜景(应天门、天堂明堂)

相继承接了央视中秋晚会、央视戏曲春晚等重大活动,坚持科技赋能,再现隋唐盛世,开展研学教育、现场演艺、沉浸式体验等各类活动,盘活遗产资源,提升了经济效益,已成为河南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殷墟博物馆新馆,改变展柜式的单一观览方式,将考古现场搬进展厅,一件件正在清理的车马遗迹标本让游客真正实现了一眼千年,自开馆以来参观人数已达250万人次。三门峡仰韶文化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立体生动展现了仰韶文化时期古人的生活习惯和建筑风格,拉近了与现代社会

面临的困境

河南的大遗址,具有集中整体连片、时代连续、内涵丰富、价值重大、形态多样、古今城市重叠等特点,且大多位于城市建成区内,保护难度较大,资金投入存在困难,活化利用、服务群众能力不足。

第一,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建设存在矛盾。河南大遗址数量多、占地面积大、类型多样,如巩义宋陵面积达189.04平方公里,占该市总面积约20%,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遗址等大遗址面积约600平方公里,占洛阳市区总面积约30%,且与城市建成区高度重合。开展相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较大,土地性质复杂,办理周期长,协调难度大,很多项目未能有效落地,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建设发展建设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第二,大遗址保护的

资金压力较大。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建设等工作,涉及大量土地征用、村庄搬迁、居民安置,资金缺口较大,且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比如郑州商城遗址的环境整治、拆迁安置,隋唐洛阳城遗址范围内搬迁了洛阳玻璃厂等企业、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的环境整治、拆迁老旧建筑和部分村庄,经费投入巨大,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

第三,大遗址的活化利用能力不足。文旅融合深度不足,部分大遗址周边环境、配套服务设施有待完善,开放及利用效率较低,群众参观体验感不佳。相关大遗址活化利用研究力量分布不均衡,对大遗址内涵阐释、推介路径、方式有待拓展,吸引力不足,对蕴含的时代价值有待深入挖掘。

改进思路

创新工作机制和制度。建立大遗址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和督察制度,推动大遗址系统性保护。研究试行河南省大遗址集中分布地区文物补偿制度,因地制宜推广郑州“生态保遗”模式、大遗址保护“洛阳模式”等优秀大遗址保护新模式。

加强组织保障和法治建设。设立大遗址考古及保护利用专项资金,加强大遗址富集地区考古、保护、研究等机构建设,培养相关人才队伍。深入贯彻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落实各方责任,加强部门协作、社会参与,营造保护大遗址的浓厚氛围。

推动文旅融合体系建设。加快大遗址基础设施配套、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等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打造殷墟甲骨文国家文化地标。高质量建设郑州、洛阳大遗址保护利用片区,加快建设开封宋都古城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打造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安阳沿黄世界级大遗址走廊。

(作者单位:郑州博物馆)



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赓续古城文脉 激扬时代新声

——参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负责人培训有感

张朝阳

近期,我参加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负责人专项培训,通过系统学习大遗址保护领域的政策理论与实践案例,聆听专家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初心的深入解读之后,对文物保护事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体会到这项工作背后“守护文明根脉、传承文化基因”的厚重意义。从考古探铲下的一捧黄土,到公园展柜里的一件文物,再到城市血脉中的文化符号,每一步都凝聚着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问,也铺就着“我们向何处去”的文化路基。

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是南北朝至明代黄河中游东岸一处规模较大、保存较好、沿用时间较长的枢纽城市遗址。遗址位于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其黄河渡口、大唐中都的身份为研究华夏文明提供了独特的时空观点。蒲津渡与蒲州故城所在地古称蒲坂,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天下之中”,是大唐六大雄城之一。蒲州在唐朝时升为“中都”,与盛唐一起辉煌。黄河岸畔的“开元铁牛”,连接秦晋两地,成为唐朝时期长安通往洛阳、太原的通衢大道。

结合永济市蒲津渡与蒲州故城文物保护所的工作实际,我有一些思考。

保护第一是“守护文明根脉”的基本遵循。这一理念在培训中被反复强调,也与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的保护实践高度契合。培训中关于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体系的案例分享,为遗址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近年来,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坚持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有序实施了蒲州故城环境整治工程、唐代夯土城墙遗迹保护展示工程、瓮城城门保护修缮工程、铁质文物抢险保护等17个保护修缮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相关遗存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展示,进一步改善了遗址保存环境,具备了遗址长期稳定保存的环境条件和公园开放条件。

目前,遗址已着手完善日常巡查制度,划分责任片区,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护,确保每一处遗存都有人管、有人护。同时,建立文物保护档案数据库,对各类遗存的基本信息、保护状况进行动态记录,为精准开展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外,还加强了安防设施系统建设,构建“人防+技防”的防护体系,借助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巡查等模式,严厉打击盗窃、破坏文物行为,筑牢文物安全防线。同时,为了确保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的文物安全,着力提升文物保护水平,使遗址分布区内各项活动有法可依,经报请运城市人大常委会研究,《永济市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保护条例(草案)》列入2025年立法计划。

挖掘价值是“传承文化基因”的关键一环。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对研究黄河中游地区的经济往来、政权交替、军

广西越州故城保护利用探索

符颖琦

越州故城遗址位于广西浦北县南流江畔的丘陵上,是南朝越州州治所在地。遗址坐北朝南,依山而筑,地势北高南低,由外城、内城构成,始建于南朝刘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废于隋大业初年(公元605年),前后延续134年,在南朝时期政治版图中占重要地位。

越州故城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南朝州治类城址。越州故城如何突破大遗址保护困境,其保护实践中所折射的理论思考与路径探索,成为观察大遗址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利用的鲜活样本。

价值认知:

考古筑基,揭开南朝南疆治理密码

越州故城的保护之路始于对其核心价值的深度挖掘。系统性考古厘清格局:2019—2022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山大学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累计揭露6400平方米。发掘成果显著——清晰揭示出“外城—内城”双重结构、依山势阶梯分布的3处院落群、8座建筑基址,以及完善的防御体系(砖包台基、马面遗迹)和功能设施(水井、排水沟、踏步等)。这一布局生动再现了南朝州治的规制与营建智慧。

物证解码文明交流:出土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等舶来品,实证了南朝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东南亚的密切往来,为“一带一路”文明互鉴增添了关键物证。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朝南疆管理枢纽”的独特价值日益凸显。

越州故城的实践印证,系统性考古是大遗址保护的根基,唯有通过科学发掘厘清格局、提取信息、阐释价值,才能为后续保护利用提供不可替代的学术支撑,避免“保护性破坏”或“盲目开发”。

保护痛点:

直面大遗址保护的现实困境

越州故城的保护利用面临的问题极具代表性。土地权属之困:城址占地300余亩,其中59亩为集体用地,其余为农民承包地。速生桉、香蕉等作物根系持续侵蚀地下遗迹,农耕活动与遗址保护矛盾尖锐。征地范围受限导致整体保护难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缺乏空间载体。

规划缺失之痛:尽管考古成果丰硕,但《越州故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长期缺位。缺乏上位规划统筹,导致保护展示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土地利用等举措缺乏系统性依据,项目申报与资金争取受阻。

资金机制之难:保护展示设施建设项目虽已在县级立项,但自治区层面未获批;陈列展大纲编制经费不足;考古遗址公园申报“缺规划、缺运营”。

这些问题直击当前大遗址保护的共性痛点——土地权属复杂、规划滞后、资金渠道单一、跨层级协调机制不畅。破解这些难题,亟须制度创新与系统性方案。

利用设想:

建设成岭南南朝时期州郡文化为主题的遗址公园

越州故城具备打造考古遗址公园的优势。保存状况好:越州故城处于村落边缘地带,城址相对保存较好,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地理环境和原始地貌。

事活动、文化交流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蒲津渡遗址是我国古渡口研究和桥梁史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在桥梁建设、水文地质、冶炼铸造、工艺造型、黄河变迁等领域,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这次培训让我明白,不能仅停留在对文物本体的保护上,更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我们积极协调配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负责的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考古工作。

2011年至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针对该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和保护研究工作,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目前已发表考古报告2部,发表发掘简报、研究性文章等10余篇。后续将组织专家学者开展专题研究,梳理蒲津渡与蒲州故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编纂相关研究著作,让更多人了解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有效利用和让文物活起来是保护工作的延伸。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积极推进蒲津渡与蒲州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培训中提到的“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理念,为公园的运营提供了指引。我们创建“永济市蒲津渡与蒲州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网站,积极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公园、进集市活动。节日期间开展文物知识竞猜、古装巡城、击鼓纳福、龙年大集、“舜陶河滨”体验、历史研学游、考古知识学等活动。开展“国宝第一市 天下好运城”系列公众考古活动,开展馆际合作进校园活动,打造“无边界历史课堂”,让历史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同时,引入制陶作坊,研发书签、纪念币等50余种文创产品,通过社会力量参与,对扩大遗址文化内涵的影响力和盘活公园运营管理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将不断推动蒲津渡与蒲州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硬设施”“软服务”双向驱动。合理规划游览路线,设置通俗易懂的解说牌和多媒体展示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让游客在参观过程中感受历史的厚重。同时,以遗址文化为核心,打造独特IP符号,构建以铁牛、黄河、渡口为核心元素的视觉符号体系,推动产品延伸,打造独特文化标识体系下的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实时展示景区的美景和文化活动,提高景区的曝光度和影响力,让文物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大遗址保护不是“将历史封存”,而是让文明在当代延续。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专业的素养,扎实做好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的保护、管理、运营工作,让这座千年故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单位:山西省永济市蒲津渡与蒲州故城文物保护所)



越州故城2020年发掘区俯瞰

考古基础扎实:2019—2022年进行主动考古发掘,面积达6400平方米,整个发掘面积广、系统性强,基本厘清了越州故城建设布局及功能分布。

保护设施:在遗址北向建设集文物库房、展览、免水生态厕所、停车场、界桩、标志牌于一体的文物保护利用设施建设。

资源丰富:越州故城周边有香翰屏旧居、施渡坡古城、伏波将军庙等文物资源,越州天湖、寿仙湖等旅游景区、南流江露营基地,浦北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与施渡坡古城联动,串联海上丝绸之路节点,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可打造“遗址+非遗+红色+农产”一站式体验的考古遗址公园,实现文化遗产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

越州故城遗址公园的建设,在岭南南朝城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上具有重要意义,对推进地方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和乡村振兴具有示范作用。

浦北计划:

规划系统性保护的创新路径

面对挑战和困境,浦北县为越州故城的保护利用,深度谋划和规划,欲为其探索出一条具有示范价值的突围之路。

高位推进展示项目:高站位高标准谋划保护展示,委托资质单位编制《保护展示设施建设方案》,拟在内城核心考古区域建设原址展示区、栈道,全方位展示城址布局,深化考古成果。

创新土地解决方案:越州故城土地为集体和个人用地,限制了文物的保护利用,可通过土地流转、生态补偿等方式协调农业活动与遗址保护矛盾,探索“保护红线内农业转型”模式,扩大征地范围,将整个城址纳入计划,为考古遗址公园预留保护利用发展空间。

专项规划引领:推动编制保护总体规划,以此为依托申请国家文物局专项经费,推动展示利用、展示设施等项目。多渠道申报:可以通过多渠道争取资金。强化规划与机制保障:将编制《越州故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置于核心位置,以规划统筹保护、利用、管理;建议自治区层面高位协调,破解土地、资金瓶颈,形成“国家—自治区—县”三级联动机制。

若能探索出一条越州故城创新保护道路,随着日后保护总体规划的落地、征地范围的扩大、展示设施的建成、管理日益完善,“越州”将以考古遗址公园的崭新形态重焕生机。

(作者单位:浦北县博物馆)